

Selected Academic Papers of
Gui Shichun

桂诗春 学术研究文集

桂诗春 著

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

总策划：庄智象

Selected Academic Works of
Renowned Foreign Language Scholars of China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Selected Academic Papers of
Gui Shichun

桂诗春 学术研究文集

桂诗春 著

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

总策划：庄智象

Selected Academic Works of
Renowned Foreign Language Scholars of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诗春学术研究文集/桂诗春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4533-1

I. ①桂… II. ①桂…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3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6760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41.75 字数 651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533-1 / Z • 0083

定 价: 90.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编委会名单

总 策 划：庄智象

编委会成员(按字母排序)：

戴炜栋 桂诗春 何兆熊 何自然 胡文仲
胡壮麟 黄国文 黄源深 卢思源 潘文国
石 坚 束定芳 汪榕培 王 蔷 王守仁
文秋芳 徐真华 许 钧 杨惠中 杨仁敬
张绍杰 庄智象

总 序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即将跨入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的实践、四十年的发展、四十年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进步，成绩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开拓和创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步入了快车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伴随着时代步伐，我国外语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斐然。外语教育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全面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功不可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心致力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推动外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繁荣、社会服务、文化传播、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外教社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语出版基地之一，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外教社策划出版的“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书”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在全国外语界和出版界

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获得广泛好评,被有关媒体列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外教社组织策划了“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计划出版100种,诚邀国内外语界知名专家学者,请他们梳理和精选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学术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和成果,结集出版,记录他们在各个外语学科领域或方面的所思、所学、所想和所为。丛书内容丰富,所涉领域广泛,几乎涵盖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外语教育、教学研究、翻译学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等各个重要领域,包括:语音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语用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作家研究、文学作品研究、英汉对比研究、翻译理论和与实践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家与翻译作品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研究、教材与教学研究、测试理论与实践研究、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学科融合与人才培养研究等,既有理论研究和提炼,又有丰富的实践体验,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语学科方方面面的实践与发展、成就与成果,是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一代学人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从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外语教育四十年改革发展的历程,外语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演变的轨迹和不断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体察一代学人的学术追求和治学精神,尤其是他们在探索和创新中体现出的既积极跟踪国际学术研究发展,及时介绍、引进各种先进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又紧密结合中国外语教育的需求和实际,积极有效借鉴他人成果,针对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现实,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创造、创新解决现存问题,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有力有效地促进和提升中国外语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的示范和引领价值。

丛书的作者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语教育领域、各个学科或学术领域成就卓著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其中不少前辈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她的变化与前行,经历和体验了发展过程,主持或参与了不少外语教育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实施,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勤耕不辍、孜孜不倦,在各自研究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敬佩、敬仰和骄傲的成绩。他们是某一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奠基

人，或是代表人物、主要建设者，推动、影响和引领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大都年事已高，从改革开放启始时的青年才俊，风华正茂的外语学术栋梁，步入了古稀、耄耋之年。整理、遴选和出版他们的优秀学术成果，正是为了弘扬我国知名外语学者敢为天下先，善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他们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那种筚路蓝缕、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

丛书的作者们与外教社有着十分融洽的长期合作，既是外教社的杰出合作者和最珍贵的资源，又是外教社员工的良师益友。他们有的从建社一开始就是外教社不签约的“签约作者”，始终如一地关心、支持外教社的发展；有的尽管合作时间稍短，但一直对外教社的各项工作鼎力相助。他们不但将其得意之作首选外教社出版，而且始终关注国内外外语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及时向外教社的编辑们提供信息，介绍成果，提想法，提建议，献计献策，有力地推动了外教社出版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支持了外教社办社水平的提升。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学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崇高的敬业精神，强烈的事业心，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勇于开拓的进取心，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不图虚名，谦虚谨慎，全心投身于教书育人事业的献身精神，始终激励和鼓舞着外教社人砥砺前行。他们中不少是教材编审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研究会、考试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等各类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领导或重要成员。长期以来，他们活跃在外国语言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研究、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评审、教师培养与发展、教学研究与评估等各个研究领域，不遗余力，不断进取，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外语出版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重大的贡献，外教社的同仁们一直心存敬畏和感激。

回顾昨天，了解历史，思考今天，直面机遇与挑战，让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前辈学人学高、身正的大师风范，展望明天，拥抱未来，奋发图强，更好地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为开创外语教育事业新局面，继续前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庄智象

2017年5月

前言

治学就是自学

——回顾和思考

《当代外语研究》索稿于我，请我写点关于个人治学的文章。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写，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同，不同的生活时代也会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别人很难复制，生怕写得不好，会贻害别人。现在恐怕只能“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对待，不要依样画葫芦。如今读报，常看有所谓90后、80后的人怎么怎么的，我是30后的人，和他们相差几个年代，横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他的那个时代的产儿，不作一点回顾，很难说清我是为什么和怎样走上这么一条自学道路。而对我自己来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明袁了凡语），做一番思考和梳理，愿将夕阳作朝阳，撒在共同奋进的大路上。

我的家庭

我于1930年出生于广州东山区。呱呱坠地没有多久，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不久建立伪满洲国，并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基本结束。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

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抗日志士奋战于黑山白水之间和中国政局瞬息万变之际，我开始了我的童年。我的父亲是陕西官费留日生，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于20年代初带着他的日本夫人回国，在广州广东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前身）医学院任外科教授，还兼任一些教学医院的院长。他和文艺界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和郭沫若更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一起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升入和毕业于九州帝大医学部，都娶了一个日本夫人，而且在广东大学也曾短期共事。两位日本夫人（安娜和花子）更情同手足。大概是在1927年间，父亲带着夫人回日探亲，途经上海，在郭家过了一夜，然后再续前程。谁知花子在船上感染上斑疹伤寒，不幸病逝，而郭也受到感染，大病一场，影响他流亡苏联的行程，才改赴日，并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甲骨文。郭认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却不知这也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因为他随后娶了我的母亲，才生了我们四兄弟。父亲是个很勤奋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因各门功课优异，考取公费留学。因为是在陕西录取，所以才报为陕西人，我的几个堂姐有的籍贯报陕西，有的却报安徽。很可能我的父辈是从安徽迁往陕西的。他对我们几兄弟的教育却不大过问，母亲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既非“书香门第”，更无“家学渊源”，家里只有几本大部头的德文医学书，中文书也没有几本。我只记得有一本《陶渊明诗集》，因为家父追求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忘情世界。他自己从不过问政治，因为和他在一起留日的人左、中、右都有，他常说这些人回国后就互相厮杀，他不愿参与，只愿做一个救人的医生。在解放前夕的一天，他和我在近佐敦道附近的弥顿道碰上老朋友郭沫若，恢复交往。郭送了一幅字给他：“学道由来贵爱民，医为仁术实可亲，送君天涯而反袂，愧我当年兰席人。”后来又送来他手写的、自己所译浮士德的《精灵之歌》，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的，大概七八岁前还能在幼儿园和小学受过一点正规教育。1937年后，为了躲避逐步蔓延到南方的战火，我们举家迁往香港，而父亲则在粤港之间来回上下班，后来还随着中大内迁云南，就更少回家。我在香港的中小学阶段，前后变换了五六间学校，没有拿过一张小学和初中的毕业证书，其间还因为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香港，只能停学在家，也曾延请过两三位家庭教师，但他们并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系统的教育，

而且时间不长。

我的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既不像上一辈人那样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也不像后一辈人那样在正规学校完成了普通教育，而是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狼烟战火中颠沛流离，时断时续地在三个小学里接受初级教育，初中阶段是在日寇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下的香港（包括元朗）度过的，只在一所叫德明中学的学校待过一年光景，到1945年日寇投降后，便又按自然的年龄段进入高中，先后在九龙华仁书院、拔萃书院、香港华仁书院读书，其间又因为得了肺病停学一年，最后才磕磕绊绊地取得香港会考的毕业证书。这也是我中小学阶段唯一的证书。在这一段时间，我从来都不是“规矩的”好学生。我刚到香港小学读书，英语就学得很糟糕。父亲有一次回家检查我的成绩，发现问题，便到坊间的书店买了一本英语拼音读本（*English Speller*），要我罚站并打手心，然后我背读本，b, a, ba... b, e, be... b, i, bi...，每天都要背。想不到居然还有点效果，后来班上听写，成绩位列前茅。

在香港沦陷初期，学校都没有复课。当时我父亲和另一位姓崔的留日回国的医生在香港开了一个联合诊所，住所就在诊所的楼上，因为他们都懂得日语，所以我们住处成为两家亲戚朋友的联合“避难所”，住在一起的有一位小学老师和一位崔医生的妹妹崔载瓦。他们的父亲为澳门望族，受过传统教育，而且爱好书画金石。崔载瓦从小跟他学习，写得一手好书法，大概练的是张黑女碑的楷书体。她就成为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首先要我练书法，而且遵从其父亲的教导，从练篆书入手。为了练书法，她又要我读《说文解字》。她自己其实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只是按部首一个一个字来学，对其中的注解也没有什么讨论和解释。她还要我背唐诗三百首，但方法有点奇怪，连题目和作者也一起背，如“临洞庭上张丞相〔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等等，但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对书法（连同篆刻）产生浓厚兴趣，经常到旧书摊上去淘宝，买到了《淳化阁帖》的复印本，练王（羲之）赵（文敏）的书体，而且乐此不疲地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看有些什么极品，居然给我淘到了一本被康排为“神

品”之一的明拓本《石门铭》和明代最后一位宰相王道周（石斋）的扇面真迹，这两件珍宝一直保存在我手中，在“文革”中才被迫上缴，不知所终。我曾经许愿到我退休以后，再来专注书法和篆刻，未想到退休后还有那么多吸引我眼球的东西，只好把我的第一个老师培育起来的个人爱好搁置在一旁。

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是一位在香港机场工作过的文员。这位老师大概是在香港的一所书院读过英语，但也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他每周两次到我家来教我们几兄弟。我算是初中班，我的弟弟们就算小学班。他每次上课既教中文，也教英语。中文课本是《古文观止》，但只是选读其中一些名篇，以散文、骈体文为主。英语课本是 Lamb 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但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仅是逐句解释，不作太多的延伸。汉语强调背书，英语则强调弄清情节。

我的第三个启蒙老师是一位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是我们举家迁往元朗后的邻居。课本是我自己提供的，那时我在旧书摊里找到一本名字叫 China 的书，是一本介绍中国给外国人看的书，大概也有些年代，谈的是民国初期的中国，有些插图的照片里的中国人还拖着一条长辫子。这位老师比较强调语法，也让我写些作文给他改。

因为时间短暂，我连这两位启蒙老师的姓名也都记不起来了。我觉得自己的真正老师其实是自己，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大敢外出。小孩子没有什么去处，就只好读书，而且有点饥不择食，什么书都看，但看书缺乏指导，囫圇吞枣，不求甚解。在小学时期我就开始读四大名著，最爱看《封神》、《水浒》，但感到《三国》文字过于古雅，而《红楼》又太婆婆妈妈。对《七侠五义》、《施公案》、《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也十分爱好，有时早上醒来，就赖在床上看书，直到中午吃饭才起床。英文书也看，主要是简写本，当时香港坊间有很多 Michael West 为印度读者而编的《新法读本》（*The New Method Reader*）的辅助读物，都是英美的小说名著的简写本，像 *The Treasure Island*、*Oliver Twist*、*Jane Eyre*、*Christmas Carol*、*The Vicar of Wakefield*、*Ivanhoe* 等等，只要能找到的，都一读为快。

我的书院生活

1945 年日本投降不久，在战争中停办的学校逐一恢复招生。家父觉得，要

待在香港，非学好英语不可，就要我们几兄弟报考英文书院。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英美人讲英语，对能否在书院读下去，心存疑虑。我们住处附近有一所拔萃女校，报名招考的那一天，我也跑去看热闹，一个讲英语的老师正在用英语向考生宣布一些注意事项，我居然都听懂了，信心大增。但因是女校，只好改报附近的一所男校——九龙华仁书院。我的几个弟弟也一起去这个学校就读，因为离家不远，中午由家里的佣人送饭，一起进餐。

香港的书院有公办的、私办的、私办公助的和教会办的几种。而所谓“名校”，多是公办和教会办的。教会办的又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两大类。当时的华仁书院分别设在香港区和九龙区两处，大本营在香港薄扶林道的半山区，都属于爱尔兰天主教教会。教师大都是爱尔兰神父，只是九龙华仁的校长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中国人，叫林海澜，为人刚烈，对学生很严格，我们背后称他为“林老虎”（Tiger Lin）。他自己不上课，但碰上有老师请假，不管什么课他都能顶上。我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请假，他就代课，教我们念一首英诗 *Some Hallucinations*（可能是 Lewis Carroll 为儿童而写的那一首）；还有一次是代数学老师的课，教四则运算，他自己带了大的尺子上课，示范怎样做演算，要求每一道题都必须用尺子来划线，绝不能马虎。在华仁读书时，我曾经转到拔萃书院（基督教教会办的）去读了一个学期，但因该校在一座小山上，离家较远，又转回华仁去。为了复学，我曾当面去找过林校长。他最初有点犹豫，说是没有学位了。后来我把成绩单给他看，他也就收读了，而且说了一番话，大致是说，办学的宗旨在于育人，把学生教好，只要有空缺，他都会接纳的；而有些学校专门去挑一些好学生来教。好学生何必你去教？把不好的学生教好，才是教育呢。我真不知道现在那些千方百计地争夺好学生的学校对照这位老校长的崇高理念有何感想。

当时书院的培养目标是文员（clerk），即政府和工商业机构里的最底层的办事员。如果是有前途的，就让他升第二班（即大学预科），然后考为数不多的大学或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从管事做起。在政府部门里，不管从哪一级做起，只要老老实实，就可以保住铁饭碗。每年的工资略有增加。我在香港华仁读完第三班，成绩平平，就有一个神父和我谈，问我要不要到一个政府部门去做文员。当时做文员的工资是 210 块港币，勉强可以生活。

应该说，我的正规教育是在战后的香港书院开始的。我的几个弟弟和同学大都是走这样的道路：有的毕业后去当文员；有的则考取大学，毕业后去当高一级的文员，甚至在政府里当一个部门的管事，起初这些岗位是不向华人开放的，后来才让少数人当上，那也是凤毛麟角。但是我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这条道路。

我的读书生活

当时香港学校（包括书院）基本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而且教师好像也不鼓励学生多看书，这也是人们通常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的标志。我从小喜欢看书，但又没有书看，只好到旧书摊去淘点书来看，可以说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所不看，包括麻衣柳庄、占卜问卦、武术防身、散文、武侠小说、文艺小说、诗词歌赋，等等，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语言学这样的东西。有时无书可看，就去读《辞海》的一些条目。后来懂得一点英文，也看一些掐去半页封面的杂志（有些过期的杂志，出版商不愿回收，只收半页封面，但卖书小贩则降价卖出），如 *Reader Digest*、*Coronet* 和一些关于刑侦破案的杂志。战后常有一些美军军舰来港补给，一些军用罐头和给美国大兵看（叫做 GI Edition）的书籍也流到市面上来，价格都非常低廉。其中也有不少佳作，如 Whitman 的 *Leaves of Grass*、Fast 的 *Citizen Tom Paine*，等等。在旧书摊里，我专门找那些平装纸面书（paperbacks），无非是因为价钱便宜，且携带方便，我最喜欢的是侦探小说，Conan Doyle、Agatha Christie、Ellery Queen 的作品是我的首选。可以说我开始的读书生活是漫无目的，而且读书“不求甚解”，实不足为训。

当时我又爱上了集邮，通过笔友会结交了很多笔友，用通讯方式来交换邮票。我喜欢收集英属殖民地的邮票，因为上面有很多风景秀丽、颜色鲜艳的图画，这是当地殖民地政府的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有一次在笔友会里找到一个在 Rhode Island 的笔友，以为又是来自一个英属殖民地，就主动与之联系。结果收到一个大包裹，内有一封信，还有很多美国邮票和一些读物、地图。写信的是一位好心老太太，她告诉我 Rhode Island 是美国的一个很小的州，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要我看看地图和其他的读物。我得到包裹后十分感动，就邮寄了一个

木雕的中国佛像作为回报。当时有一种邮局发行的航空信笺，只有一页，一面是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另一面就是给写上信的内容之用，写好后叠在一起加封，就作为空邮寄出，价格比一般航空信要便宜得多。我经常买备一叠信笺，每周都要寄七八封。当时我的笔友有几十人之多，遍及全球。在通讯中除了交换邮票外，往往还相互介绍一些当地风俗人情。通过交友，我既增长了地理知识，也提高了写作能力。因为要在薄薄的一张信笺里写更多的东西，使我养成这样的习惯：直接把信笺放在我那破旧的打字机上来写信。这样做，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打下来就不能改了；好处是培养了我的思维能力，把用什么样的句子讲什么话，都事先想好，然后就打下来。我觉得好处比坏处要多。

读书还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我曾因为看了冰心、郭沫若的自传体的散文和小说，就去模仿写我的童年，因为看了《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就去写武侠小说，但因为没有生活，写了几回就辍笔了，例如我的武侠小说，以芜湖为背景，但对它一无所知，当然写不下去。当时香港战后的中文报纸也慢慢多起来了，家里订了一份《新生晚报》，该报有一个副刊，每天都登一篇《怪论》，我用“你唔知”（广州话的“你不知道”）的笔名，写了两篇：一篇对香港殖民地生活不满，另一篇则针对当时国民政府把外蒙让给前苏联。居然都给采纳了。从此我就给该报投了一些源自国外杂志（如 *Coronet*）的奇闻杂趣的小文章，因为篇幅不大，适宜于做“报屁股”，也多半为编辑所采纳，后来居然还把我编写的一篇关于宋美龄在美国生活的较长的文稿作为副刊头条连载。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东西都是半写半译的，均非我所创作。这大概都是 1946—1947 年间，用的是笔名“明磊”，后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没有意思，没有什么保存价值，就让它们淹没在芸芸众生的报海里。

这是因为我在 1947 年以后参加了一个由香港进步团体新民主出版社举办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其实也没有什么活动，只需交一笔钱，他们就把新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寄到我家里来。我又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那些在我面前展开一个新世界的读物，这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等，也开始订阅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周末报》。在文艺书籍方面，鲁

迅的杂文也取代了巴金的小说和冰心的散文，成为我的至爱。总之，我开始“赤化”了，我首先做的自我反省是批判我在《新生晚报》写的那些“帮闲”文章，而且开始学习写鲁迅风格的杂文，还订阅前苏联的《苏联文学》（*Soviet Literature*）和美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并开始改用“史村”的笔名向《文汇报》、《大公报》投稿，多半为杂文，居然也好一些被录用。我的思想像一朵鲜花，但在书院的局促空间难以绽放，觉得书院的课程枯燥无味，后来居然到了难以容身，便开始逃学，自己跑到一些公共图书馆去看书。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为自己定向，要当一个“文艺青年”。《苏联文学》那时发表了一位年青作家冈察诺夫写的小说《金色的布拉格》（*The Golden Prague*），写的是二战中苏联反击纳粹的故事，气势磅礴，十分感人。我于是就着手把整本小说翻译出来，谁知刚一脱稿，诗人袁水伯的译本就已经上市发行了。我等于做了一次练习，也完了我的“翻译家”的梦。这部译稿我保存至今，算是我踏入新征途留下的印迹。

这个时候刚好有一所为进步人士办的夜校，叫做中业学院，董事长是郭沫若，校长是成庆生。这个学校遵循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我们的结业证书上就印有他的两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课程按文学、经济等专业分类，每天晚上上两节课。我于是报了文学组，上课的老师有楼栖（文艺理论）、司马文森（中国现代文学史）、黄秋耘（小说）、黄宁婴（诗歌）等，都是当时华南著名的文艺界人士。我参加的不是第一期，据说在第一期里，郭沫若、茅盾都去讲过课。学校就在我家附近，于是我白天到书院学习，晚上就到中业上课，那里有很多追求进步的同学。当时我们几个爱好文艺创作的青年还办了一个春泥社，大家掏腰包来办了一个叫做《春泥》的同仁小杂志，我还走访过楼栖和黄秋耘，约他们为杂志写稿。楼写了一篇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章，杂志上还登了我从前在苏联出版的《高尔基选集》里找到的一篇散文，名为《同志》。这个小杂志没有什么知名度，读者不多，而我们几个人都是穷光蛋，难以为继，出了一期就夭折了。

当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随后解放南京和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广州也解放在望。我们这些进步青年都渴望回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哪里还有心待在书院里过那种晨钟暮鼓的生活。我这个一心要当文

学家的青年，渴望很快就投入生活，可是在内地并无什么关系。后来我听从了一个在新华社临时落脚的青年的劝告，回内地去念大学。于是就在1950年回到刚解放的广州，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我对考试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实在没有经过多少正规的中学教育，而且香港的书院在理科方面远不如内地中学。例如数学在当时香港中学会考中有数学和初级数学两门课可供选考，而内地则教到高等数学。我在香港会考中选考的是初级数学，所以对高考的数学科只能交白卷。我对内地大学的情况一无所知，任意报考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武大。北大是因为它在我国的首都，武大是因为招生广告宣传珞珈山多么漂亮。我也想报考青岛大学和杭州大学，但它们的考试和武大的考试在同一时间段。谁知道我报考的两个学校都榜上有名，北大在广州只录取两人，我是其中之一。武大没有按地区排录取生，后来我到武大报到，才知道我是外语系录取的第二名。同学们告诉我，可以到教务处去查分数，结果一查，数学是0分，化学是7分，我得分主要是靠英语、语文和历史。后来我才弄明白，当时刚刚解放，各个学校恢复招生，生源不多。我舍北大而奔武大，也没有太多原因，主要是因为武大的体检通过，而北大则要求我再作一次X光检查，而我则因为痔漏开刀，已经请了两周的假，怕耽误时间。

火红的大学生活

我平生第一次只身来到了武汉的珞珈山，马上就被解放后那火热的生活所吸引，积极投身各种政治活动。武大当时的秘书长（实际上是党代表）就是鲁迅批判过的徐懋庸，他给我们上《社会发展史》，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中间休息两次吃饭），我们在大礼堂坐着小板凳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学校又开展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大概当时很注意吸收一些学生参加领导层，而我的履历又有参加过为报纸写作的经验，被任命为校刊《新武大》的副主任委员（主任是教务长、法律名家韩德培），其实仅是挂个名，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法律系的一位姓张的讲师，我只是当跑腿，管点具体事务，从校对到排字房去看老师傅改字粒和拼版，从分发报纸到把徐懋庸的发言（或社论）校样送到他家，等等。偶尔也写一点报道或小评论。当时的运动席卷全校，把很多老教授都卷到里面去，

《新武大》也出得越来越频繁，有时隔天就一期。课堂教学则处于半开半停的状态，英语课程的内容很浅，老师是留法袁昌英教授，她倒是十分开明，叫我不用来上课，可以到高年级去选听任何一门课。我听了一下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又恢复了我的自学生活，因为文艺创作搞不成（但也发生一件小事，当时宿舍一个房间住8—9人，常有些磕磕碰碰的地方，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把性格不同的几位同学的争吵描写在一个小笔记本里，谁知这个本子给同屋的同学发现传看，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认为十分传神），就决定转而自学文艺批评，于是就捧着一本苏联出版的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选集到图书馆去看，同班同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在武大大概两年多，其中有一年是因为查出有肺病而被停学休养。当时没有什么治疗条件，而武大一位副校长自己染有肺病是靠卧床休息，加强营养而治好的。他就只好采取行政措施，让所有染有肺病的学生休学一年，就地卧床休养，免费吃营养餐（三荤一素，另每天加一个鸡蛋）。所以我在武大的两年多，不是搞运动就是休养，学习上无大进展。其后因为院系调整，武大外语系的学生和部分教授，和中南区的几所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一起合并到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到中大的一年多，虽然小运动不断，但读书的环境大大改善，在戴镛龄、骆传芳、蔡文显、王多恩、谢文通、骆夏露德等教授的教导下，我完成了高年级的课程，在大四两个学期，全部课程都得了5分。这是因为中大所开的各门课程都和我的志愿比较吻合，而这些教授又都有真才实学，而且教学认真负责。但在这一段时间，我和另一个同学却经常被省外办借调到广州去做英语翻译，少则几天，多则超过一个月。我记得在尼赫鲁第一次访华时，有一个印度报业集团的记者代表团（由几位印度重要报纸的记者组成）为他打前站，他们从香港过境，我就到深圳接车，一见面就有一个记者问我：“你们国旗的五个星是什么意思？”我据实回答，他们十分满意，在广州参观了几夭，我负责全程陪同，最后一起坐火车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当然免不了要到各个仰慕已久的景点参观——从故宫、颐和园到鲁迅故居，然后才坐火车回穗。但是回校后等着我的是谢文通教授开设的莎士比亚课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威利斯商人》，考试方法是拿出其中的几段话要我们论译成现代英语，而我却漏了几次课。这可是实打实的，不能靠胡诌几句就能敷衍过去，于是在归途的短短两天中我就在火车上突击看莎剧。回校后参加考试，居然在以